

传统口头史诗文本的辨识与编辑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

史诗是民族历史文化发展脉络中以口头形式创制的具有多重文化价值的古老文化遗产,是无文字时代民族民间文化的集大成者。它不仅堪称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而且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在我国民间口头文学坐标系中,以《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等三大史诗为代表的数以百计的各民族大小史诗作为一种宏大的叙事文类,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多得的独特文化样式。尤其是我国的三大英雄史诗,不仅在中华民族文化大观园中占据显著而重要的位置,而且早已成为人类口头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作而享誉世界。

史诗不仅有其显著的文类特征,而且拥有独特的产生、发展、传承、演述规律。在演述时间与空间上,口头史诗在文本类型的多重性方面,在演述艺人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方面,在文本产生的社会空间和民俗语境的关联性方面以及传播方式的复杂性方面,均有自己的特殊经纬度。自古以来,我国很多少数民族都有大量史诗以口头形式流传于民间。我国南北方不同民族中流传的史诗文类有一定差异,北方各民族以英雄史诗居多,南方各民族史诗具有显著的神话特征,但无论如何,作为同一种专属的独特文类,它们都具有该文类应该具有的共同性和普遍性,并且这种共同性和普遍性也已经得到国内外学界的普遍认同。当然,我国南北方史诗的多样性特征以及对其多样性特征的探索已经成为我国学界对世界史诗学的新贡献,并逐渐得到世界史诗学界的认可和尊重。

我国学界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大规模搜

集、编辑、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各民族的口头史诗,与世界史学对话交流以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史诗学理论建树也是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才开始。但是,在民族活态田野资料基础上展开的田野工作实践和学术研究方面的开拓,使我国的史诗学科异军突起,长期的对话和交流不仅使我国史诗研究登上了西方话语体系霸屏的学术阵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掌握世界史诗学科的主导权。这都应该归功于我国几代民族史诗研究学者勇于探索的精神、我国丰富多样的活态口头史诗传统的蕴藏以及各民族学者们高质量、多层次的史诗研究成果的产出。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目前对于口头史诗本质的认识和阐释解读依然停留在为数不多的学者们所构建起的象牙塔之中,并没有在民间得到广泛普及和运用。所以,有些口头史诗编辑整理人员至今因缺乏对于口头史诗本质的全面而深刻的认识,而导致在应对口头史诗文本时无所适从。

目前,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作为一项烛照后世的高层次的国家文化工程,需要我们群策群力,尽心尽责,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去完成这项光荣使命。就目前史诗示范卷编写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在一定范围内对编纂规范原则、编纂体例和选

本标准、翻译整理标准等问题开展深度的学术交流与探讨,为保质保量地完成编纂任务打下良好的基础,为今后的编纂工作发挥示范引领和学术指导作用。

口头史诗顾名思义就是以口头形式传承的史诗。因此,口头性便是这类史诗作品最本质的特征。只有对其口头性本质进行全面充分的把握,才能使我们编辑整理翻译时少走弯路和歧路,以科学的方法完成使命。关于史诗的口头性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而对于口头史诗区别于书面文本的最关键的就是其“在演述中的创作”。也就是说,一部纯粹的口头史诗在创作方式、传承渠道、听众接受等方面与书面文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口头史诗“在演述过程中创作”的本质特征是帕里和洛德在口头史诗的程式、典型场景、故事范性这三个结构层面进行研究讨论后确立的,这给口头文学的认知带来了颠覆性变革。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其实19世纪中叶,德裔俄罗斯探险家和语言学家拉德洛夫对于中亚吉尔吉斯及我国柯尔克孜族地区《玛纳斯》演述传统的田野调查及报告是帕里和洛德理论的滥觞。在当前口头史诗学的讨论中,口头史诗文本的即兴创作特征在限度之内的变化以及没有任何可资参考的权威本或者标准精校

本,口头传统对于史诗歌手“在演述之中的创作”即时产生的口头文本的辐射力和约束力,通过书面文本的讨论无法确立口头诗学等等都是绕不过去的问题。

由于我们在筛选编辑过程中面对的是来自不同渠道的、各种形式的口头史诗文本的书面化形式,而编辑整理的目的是为了给予习惯于书面阅读的读者,而非口头史诗的听众,提供比较理想的史诗内容和尽可能完整的故事内涵,让他们在阅读中感受史诗的魅力,体验史诗在阅读中的审美情趣。记录在案的口头史诗文本常有“重复”“冗余”“啰嗦”等特点,因此,口头史诗的全面认知可以帮助我们对此作出比较明确而客观的评价,也能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地区分、提炼史诗内容的核心主题和结构,从而最大程度保持口头史诗的原始特征。这不仅是对此类古老文类形式和传承者应有的尊重,同时也是对当下社会文化进程和当代读者负责的态度。

口头史诗文本除了固定故事框架之内的稳定性之外,还具有因演述环境、演述现场的语境以及史诗演述人自身的演述水平和身体状况而使史诗文本产生的变异性,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使同一部史诗具有不同的文本,在不同演述歌手的演述中带上他个人的一些主观色彩,或者是不

属于原本传统的瑕疵甚至一些受当时历史社会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糟粕,而这些正是我们需要剔除并进行适当整理的地方。我们在这里的讨论主要是针对口头文本而言。对于从歌手口中摘录的文本及手抄本、刻本等不同的史诗文本来源的正确区分与辨识,我们同样应给予高度重视。对于不同的文本形态需要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史诗文本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存在各种学术性和技术性问题。文学翻译总体有两种基本策略:一个是文化翻译,一个是迂回的文学创新翻译。前者重视原文的文化因素,以此来表明民族语言之间的差异性和译出语的特殊性,那么译者就必须以音译方式保留原文的独特音韵、古词、原型及其文化艺术特征,通过注释等手段给译文附加很多文化因素,尽可能多地传达出原文的深刻内涵;而后者则更加注重译文给读者的阅读快感,尽量用译入语的音韵词语消弭译出语的独特性,无疑这会一定程度上丢失原文中的民族文化基因。每一部史诗都是本民族文化的标杆,其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民族文化基因。如何在翻译时处理好上述关系也是我们在编纂口头史诗时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之一。



赫哲绝唱 再焕新生

高荷红

20世纪80年代前后,在多次踏查满一通古斯语族各民族民间文学遗存的基础上,马名超提出东北存在一条狭长的史诗带,其中最耀眼的明珠就是赫哲族的伊玛堪。赫哲族人口较少,2010年时统计数字为5354人。赫哲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语言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满语支,伊玛堪由赫哲语演唱,为该民族传承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人文习俗等的唯一形式,堪称“北部亚洲渔猎文化的活化石”。1934年,《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出版,为新中国成立后民族文化调查、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调研、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幸得前辈学者的调查,留下了珍贵的“伊玛卡乞玛发”(史诗歌手)演唱录音录像资料,并以此为基础出版了多种文本。20世纪80年代前后出版的《伊玛堪》(上下卷)成为后来诸多版本之源,文本最全的是2013年出版的《伊玛堪集成》(上中下)。民族语汉语对照本有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1989年出版的《赫哲族伊玛堪选》,收入《满都莫日根》《沙伦莫日根》《木都力莫日根(片段)》《木竹林莫日根(片段)》;2012年出版的《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英雄叙事诗·赫哲族卷》,除了前四个文本的完整本外,另收入《香奂莫日根》《希儿达鲁莫日根》《安徒莫日根》《希特莫日根》。英文翻译本有2013年出版的《中国赫哲族史诗伊玛堪(英文版)》,收入《香奂莫日根》《满都莫日根》《满格木莫日根》《木都力莫日根》。

21世纪后,赫哲族伊玛堪发生了若干值得关注的事:2003年,最后一位歌手尤金良去世,《希特莫日根》成为最后一部被完整记录的伊玛堪;2006年,赫哲族伊玛堪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08年,吴明新、吴宝臣成为赫哲族伊玛堪国家级传承人;2011年11月2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厘岛会议批准伊玛堪为“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会议文件对伊玛堪作出如此评价:伊玛堪“有助于赫哲人的认同和凝聚,构成其历史和价值观的载体,并为之提供了连续感,在季节性劳作和节庆活动中发挥着集体记忆、教育和娱乐的功能”;2011年始,吴明新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敖其镇开始教授赫哲语,后成立伊玛堪讲习所,讲习所渐次扩大为四个;2016年,齐艳华发起微信群“团结的赫哲人”,坚持每天学一句赫哲语,群员共238人;2017年,尤秀云演述的12章《希特莫日根》的录音资料作为向联合国履约的文本。

2018年,《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史诗·黑龙江卷·伊玛堪》13部文本中,12部选自1997和1998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伊玛堪》(上下卷),仅《希特莫日根》选自《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英雄叙事诗·伊玛堪》。

伊玛堪的演述必须依托赫哲语,汉语与赫哲语对照的文本20世纪80年代就由尤志贤完成。在《赫哲族词典》及伊玛堪赫哲语国际音标对照本的编纂过程中,尤志贤堪称先驱,傅万金坚持不懈,近年来翻译《希特莫日根》8卷伊玛堪顺利完成联合国履约工作。吴明新、吴宝臣与10位省级传承人及微信群“团结的赫哲人”,身体力行,以面授等方式教授赫哲语。

20世纪70年代,黄任远被伊玛堪吸引,开启与伊玛堪半个世纪的缘分,他不间断地采集伊玛堪,与多位歌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80年代,《黑龙江民间文学》的主编王士媛与马名超、黄任远、张嘉宾等学者先后到赫哲族聚居区调研;1980年和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教研室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黑龙江分会(黑龙江民协)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曾两次赴三江地区采集《香奂莫日根》。每一次文本的采集,黄任远都是参与者;21世纪初,于晓飞也是在黄任远的多次陪伴下完成了对尤金良的采访录音。

正因为国家对民族民间文化持续的重视,伊玛堪歌手的积极传承,多位学者的努力,才让不足万人的赫哲族能够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编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史诗卷》,其重大的文化史意义定当得到当代和后人的认可和赞誉。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史诗·新疆卷》

紧扣时代脉搏 再现史诗魅力

■马雄福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意义深远。2017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对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作出全面部署。由中国文联负责组织实施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被列入其中重点实施项目。

2018年,“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正式将《玛纳斯》第一部(1-4卷,汉译本)、《江格尔》(1-3卷,汉译本)、《哈萨克达斯坦》(1卷,汉译本),共计8卷(每卷100万字)列入首批编纂出版示范卷本。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首先组织协会工作人员和有关专家学者,认真学习“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的相关文件,领会其精神实质和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把“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的《实施方案》和《工作手册》印发到每位参与者手中,并召开动员会、座谈会,在学懂弄通的基础上,按语种分工负责,摸底调研,循序渐进,持续推进编纂筹备工作。

根据“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的编辑体例要求,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各民族民间文艺专家,依照民间文学的类别,分组从梳理资料入手,经审读对每部作品写出初审意见。因为同一部作品往往有不同的变体、异文和讲唱者,在遴选过程中,我们既要考虑到作品的完整性,又要看到其流布面和代表性,优中选精,并召集各民族民间文艺专家经过充分论证,优化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新疆卷》的编纂篇目,制定了8年的出版计划。

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史诗《玛纳斯》《江格尔》被人选示范卷。新疆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各民族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创造了丰富的民间文化,被学术界誉为天然的民俗博物馆。同时,这些丰富多样的民间文化资源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举世瞩目、闻名遐迩的中国三大英雄史诗:《江格尔》《玛纳斯》《格萨尔》。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第十次文代会、第九次作代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中华优秀

赫哲人以伊玛堪为荣,口耳相传,世代传唱;伊玛堪为赫哲族争光,唱出国门,走向世界。伊玛堪是历史悠久、用赫哲语说唱的英雄莫日根之歌,是其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象征。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入选联合国“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学术界,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伊玛堪反映了其民族的征战史、迁徙史、渔猎史,记录了其民族的风俗习惯和萨满信仰,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鲜明的民族风格,被誉为“北部亚洲渔猎文化的活化石”和“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活标本”,是赫哲族活着的口碑历史和百科全书,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

2016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到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专程前往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乡看望,与赫哲族群众聊生活和生产、谈民族文化遗产,饶有兴趣地观看伊玛堪传习教学,赞扬伊玛堪很有韵味。2017年8月上旬,中国民协主席潘鲁生来黑龙江检查民间文学保护工作,召开座谈会,访问民族聚居区,调查民间文学采集和保护,专访老专家、老学者,布置编纂工作任务,落实省卷领导小组和编委会成员,在报刊和网络平台撰写发表了介绍黑龙江民间文学和史诗专家的文章。这些关怀和举措,极大地鼓舞了赫哲族人民和编委会成员,大家表示要为抢救和保护人类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

在编纂工作中,我们遵照《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史诗卷编纂体例要求和《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手册》等有关文件,搜集了伊玛堪代表性传承人、重要演述场景、重要民俗实践、重要史料的照片300余张,从中精选出90余张;搜集了刊有伊玛堪作品的十余种书籍和版本,最早的是1934年出版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最近的是2014年出版的《伊玛堪集成》。在编纂全卷时,概述一文四易其稿。伊玛堪作品选用13部长篇伊玛堪和凌纯声在1930年采集的一篇伊玛堪故事。在每部作品前撰写了内容简介、演述者简介,介绍了采集过程和发表情况。卷后还撰写了三篇附录,分别是《作品中的赫哲语和汉语对照表》《作品中的东北方言和汉语对照表》《翻译、采集整理者简介》,使本卷内容更好反映出伊玛堪的传承现状。

伊玛堪的采集保护工作从1930年开



歌剧《玛纳斯》



歌舞剧《江格尔》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史诗·黑龙江卷·伊玛堪》

让伊玛堪传承下去

■黄任远

始,已走过了近90个年头。上世纪70年代,黑龙江省民协主席王士媛主抓全省民间文学的采集保护工作。1980年,她组织了伊玛堪抢救小组,采集到长篇和短篇伊玛堪12部。1982年4月,她亲自深入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采集了葛德胜说唱的《木都力莫日根》。另外,她还编辑出版《黑龙江民间文学》1-21集,约有500余万字,其中第2集、第20集、第21集是伊玛堪专集,首次发表伊玛堪7部长篇和5部短篇。在此基础上,1997年和1998年,由黑龙江省民协编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伊玛堪》上下卷,共计120万字,收录14部伊玛堪长篇。以上这些采集成果,为本卷编纂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卷在2018年8月完成初稿,先后有7位史诗专家组专家和学术委员会终审专家参加审稿,他们分别是斯钦巴图、阿地里·居玛吐尔地、高荷红、陈岗龙、林继富、高丙中、朝戈金。以

上专家学者审稿后共提出49条修改意见,其内容涉及文本的代表性、语言的规范性、概述的结构等。

作为主编,我深感肩头责任重大。我是1969年3月从杭州市下乡到黑龙江同江市的。在同江,我生活工作了25年,采集了5位伊玛堪老歌手说唱的20余部伊玛堪的长篇和短篇。1980年,伊玛堪歌手吴连贵临终前对他的女儿说:“你去告诉同江县委宣传部的黄老师,让他把我给他说唱的伊玛堪和故事传承下去!”不久,他女儿跑到县城来找我,告诉了他父亲的遗愿。

1989年夏天,我听说伊玛堪歌手尤树林病重,专程回同江街津口村看望老人。尤老拉着我的手说:“小黄,我相信你一定能把我讲唱的东西整理出书,传承下去的!”这些年来,这些歌手的临终遗愿不断鞭策着我尽力做好对赫哲族文化和伊玛堪的传承、保护、研究等相关工作。我一定要完成老歌手们的遗愿,把书稿编好,上交合格答卷,让伊玛堪传承下去。